

加快建设
全国统一大市场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这要求我们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通过发挥统一大市场的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市场监管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核心内容与重要支撑。厘清统一大市场建设与市场监管现代化之间的关系，回应统一大市场建设进程中的市场监管问题，充分发挥市场监管推动统一大市场建设的作用，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统一大市场建设与
市场监管现代化相互
形塑

近年来，在“大市场、大质量、大监管”理念的指引下，我国政府积极推进市场监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并着力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指出，通过完善市场基础制度、市场设施、市场交易内容、市场秩序等，改变当前国内市场割裂的情况，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其中一个核心任务是从监管规则、监管执法、监管能力三个方面入手，推动市场监管的公平统一。

市场监管现代化是统一大市场建设的题中之义。统一大市场建设旨在打破空间限制和行政限制，形成市场交易大格局，促进商品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畅通流动，这要求政府转变市场监管职能的履行方式，破除对市场不合法、不合理的禁锢。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的力量在全国范围内日渐壮大，计划经济体制松动，政府从商

以市场监管现代化引领和驱动
统一大市场建设

□ 朱心怡 郁建兴

品到服务领域逐步减少行政管理制，并着力构建基于市场经济的市场监管体系。市场监管的改革内嵌于统一大市场构建的过程中。

加强市场监管是统一大市场建设的落脚点和着力点。科学合理的市场监管有助于规范市场秩序，提升市场效率，减少市场失灵造成的福利损失。“放管服”改革以来，政府探索了一系列监管措施，通过体制机制创新，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应对市场新涌现出的监管挑战。

市场监管现代化对统一大市场的形成具有驱动力和牵引力。市场监管现代化不仅仅是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子命题，也是统一大市场形成的重要动力。市场监管贯穿市场主体参与市场经济的全生命周期，是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的重要支柱。公平统一的监管并不意味着对市场主体采取无差别的管理，统一大市场也不意味着整齐划一的行动。相反，通过市场监管实现市场交易的机会平等、过程公平、结果合理，才能更有效地促进良性竞争，助力统一大市场的形成。

统一大市场建设进
程中的市场监管掣肘

近年来，《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行动方案》《“十四五”市场监管现代化规划》等政策法规相继出台，提出了市场监管改革的综合性框架，弥补了监管空白，夯实了监管基础。然而，市场监管依然存在越位、缺位和错位的现象，对统一大市场的建设造成掣肘，不利于形成有效

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合力。

市场监管领域依然存在管制性的制度障碍，这既包括已有不合理规则，也包括人为设置的障碍。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要“清理和废除妨碍全国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一方面，近年来通过政府简政放权，大量的行政审批已经取消、下放、改为备案等，极大地降低了市场主体的进入门槛，但当前依然存在不少政府越位的情形，如许多本是市场主体自主经营范围内的事项，却由政府以考核形式代为决策或强制执行。另一方面，在现有地方政府竞争的逻辑下，为了争夺市场资源，一些地方政府依然存在突破既有规则，擅自设立前置性管制条件的情况，以行政管制为工具，对市场主体的准入和正常经营进行限制。此外，为应对疫情防控，一些地方采取的管制措施未能通盘考虑对市场生产、流通环节产生的负面影响，带来市场主体的种种发展困境。

市场经济迅猛发展凸显市场监管更新不及时。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的发展撬动了传统经济形态的裂变，数字经济方兴未艾，也同时带来市场经济与市场监管的三重矛盾。一是市场活动的跨区域性、跨领域性和市场监管的本地化、部门化之间的矛盾。在技术的加持下，市场主体的活动范围早已呈现跨区域、跨领域的特征，尤其是线上市场更具流动性、可变性和隐蔽性。然而，当前政府的市场监管职能依然内嵌于行政体制，按行政区划界定的监管权力

边界在处理跨区域监管议题时容易造成隐性的地方保护，而按部门设置的监管职能在面对综合监管对象时依然难解“九龙治水”的困局。二是创新的野蛮生长与监管的无法可依之间的矛盾。市场监管是政府的法定职能，依法行政是其履行职责的前提。当前，市场监管体系针对新业态带来的挑战作出了不少回应，然而，监管制度的更新依然落后于市场经济活动的快速迭代。三是经济发展与国家安全之间存在张力。统筹发展和安全是当前国家治理的重大原则，数字技术在激活市场生命力的同时，带来数据安全、隐私保护、权益维护等监管新难点；反对垄断和不正当竞争，防止资本无序扩张是市场监管的新重点，要求政策进行有序引导。

市场监管理念和能力有待更新与提升，以适应统一大市场的发展。监管理念层面，一方面，当前一些行政职能部门认为监管只是市场监管局一家的职能。201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将原工商、食药、质监三个部门合并设立了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但市场监管职能实则分布于众多行政职能部门中，政府的市场监管职能转变是一项整体性工程。另一方面，一些干部认为只有执法才是监管，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市场监管职能履行，也使得市场监管成为一项“破坏”地方营商环境而“不受待见”的职能。监管能力层面，受制于资源、财力和人力的约束，经济发达地区因为市场主体数量众多、经济活动繁杂面临着管不过来的窘境；经济欠发达地区则可能因为技术的制约面临着难以实施监管的

困境。基于此，容易产生设置准入限制、以罚代管等应付之道。

充分发挥市场监管
推动统一大市场建设的
作用

建设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业已成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政策议程的重要内容。着力破解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对象制宜地开展科学、有效、精准的市场监管，增强市场主体参与经济活动的动力和活力，将有效推动统一大市场的最终落地。

健全市场监管制度体系，提升市场监管效率，保证统一大市场的高效规范。清理和废除妨碍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各项市场监管规定和做法。加快补齐针对新业态新业态新模式的市场监管法律法规、政策规章、标准规则等正式制度的空缺，避免市场监管无法可依、无章可循。处理好创新和监管的关系，分阶段考虑监管目标和监管重点，在新业态萌发期以包容审慎的态度加以应对，避免过度管制，在扩张期注意引导和规范，降低监管风险。完善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规则，加强市场监管制度体系的连贯性、衔接性和一致性，理顺同一主体的监管要求，减少“政策打架”情况。加强审批、监管和执法之间的协调配合，确保行政改革的步调相近，避免放大快、管不住、罚不了等协作不畅问题。注重市场监管和其他制度规则运行的适配度和互嵌性，既要确

保市场监管职能的规范履行，也要防止市场监管沦为兜底工具，避免为配合其他工作而出现应付式监管等情况。

创新市场监管体制机制，加强市场监管公正执法，维护统一大市场的公平竞争。厘清政府市场监管的职能边界和权责分配，结合市场主体特征采取差异化的监管策略，实现监管任务在纵向政府层级之间、横向职能部门之间、政府与其他主体之间、线上线下范围之间的合理分配与有效协同。以数字化推动市场监管的流程再造、职能优化，倒逼市场监管系统重塑，推进市场监管整体智治。构建以信用监管为基础、重点监管为补充的新型市场监管机制，结合市场主体信用风险实施分类监管，引导监管资源有效配置。健全公平竞争审查机制，加强落实维护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公平竞争制度。倡导包容性治理，综合应用教育劝导、行政约谈、责令整改、立案查处等工具，优化完善行政执法程序，规范行政执法行为，既避免市场监管“一刀切”，又减少政府市场监管行为的任意性和武断性。强化市场监管政策反馈机制，拓展社会共治网络，构筑市场监管政策闭环，提升市场监管的科学性、公平性和有效性。

消除市场监管制度性障碍，增强市场监管效能，推进统一大市场的充分开放。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市场开放和制度型开放，注重多重监管目标的调适与平衡，在开放环境中动态维护市场稳定和经济安全。倡导监管和服务有机融合，寓监管于服务，以服务促监管，打破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消除对市场主体准入、退出及正常经营的不合理限制和干预，增强市场监管政策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转变传统市场监管思路，探索智慧监管，实现从静态结果监管到动态过程监测转变，从以罚代管到信用约束转变，提升市场监管对风险和问题的实时预警、精准研判和动态处置能力。推进市场监管制度型开放，加强国内市场监管领域的规则、标准等与国际的接轨和合作，同时在数字治理领域争当国际标准及规则制定的先行者和引领者。

（上接1版）

三个历史性胜利
源于习近平总书记掌
舵领航和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指引

三件大事所体现的“历史性胜利”，既是我们党经过百年奋斗用伟大成就给出的历史性结论，也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面对国内外形势新变化和实践新要求，从理论和实践的結合上深入回答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党治国理政面临的一系列重大时代课题所给出的生动答案。这些历史性结论和生动答案，无不透出新时代党的领袖掌舵领航的伟力和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的指引力。

三件大事所反映的“历史性胜利”，从根本上说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团结奋斗、攻坚克难的伟大胜利，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集中统一领导的伟大胜利，充分体现了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充分展现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应有的“大的样子”。在14亿多人口的大国要干成这样的大事，如果没有全党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是难以想象的。十年来，在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举旗定向下，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和最大制度优势，始终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这一最高政治原则，系统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全党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确保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确保党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正是如此，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显示出勃勃生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迈向更加光明的前景。

三件大事所反映的“历史性胜利”，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的伟

大胜利，充分显示出“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的深刻道理。十年来，我们党之所以能够采取一系列战略性举措，推进一系列变革性实践，实现一系列突破性进展，取得一系列标志性成果，经受住来自各方面的风险挑战考验，关键在于我们始终全面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特别是全党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有了根本遵循。这一创新理论特别强调坚持人民至上、坚持自信自立、坚持守正创新、坚持问题导向、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胸怀天下，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能够指导我们解决一系列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在推动新时代社会实践发生深度变革的同时，也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进程。这一创新理论，是科学逻辑、实践效果和人民认可的高度统一，为取得“历史性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及其所取得的“历史性胜利”，是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取得的。党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反映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心愿，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认清了伟大变革和历史性胜利的根本原因，就明白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极端重要性、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确保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确保党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正是如此，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显示出勃勃生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迈向更加光明的前景。

敢于斗争、敢于胜
利,创造令世人刮目相
看的新的更大奇迹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闭幕会上强调，“中国共产党走过了百年奋斗历程，又踏上了新的赶考之路。一百年来，党团结带领全国

各族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胜利，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百年成就无比辉煌，百年大党风华正茂”，进一步重申了过去“历史性胜利”的重大意义。在此基础上，为了在新时代新征程创造令世人刮目相看的新的更大奇迹，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提出了“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重要要求。这就告诫我们，过去的“伟大胜利”，蕴含在“伟大斗争”中；未来的历史征程，仍然需要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只有敢于斗争，才能敢于胜利。

回望过去，在三件大事中所取得的历史性胜利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得来的，而是蕴含于伟大斗争中的。一百年来，我们党带领人民面对各种各样的风险挑战，甚至生死存亡的考验，练就了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鲜明政治品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面对影响党长期执政、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幸福安康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果敢抉择，锐意进取、攻坚克难，团结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撸起袖子加油干、风雨无阻向前行，义无反顾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进一步彰显了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政治品格。

展望未来，在三件大事中所取得的历史性胜利基础上续写新篇章，还会经受更多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更要求我们做到“三个务必”。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重要要求，特别是把“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提到“三个务必”的战略高度，恰恰说明“伟大胜利”必然包括“伟大斗争”的深刻内涵。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需要 we 们继续发扬斗争精神，提高斗争本领，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以团结奋斗的姿态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绚丽的华章。

（作者系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对外合作交流局局长、研究员）

农民愿不愿意种粮、愿意种多少粮，关键是看种粮能给农民带来多少收益。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健全种粮农民收益保障机制”。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一系列强农惠农富农政策的支持下，我国粮食产能稳步提升，粮食产量连续7年稳定在1.3万亿斤以上。但粮食生产成本的刚性增长压缩了种粮农民的利润空间，粮食生产净利润连续多年在盈亏线上下徘徊。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稳定发展粮食生产，一定要让农民种粮有利可图、让主产区抓粮有积极性。这既要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也要加强政府支持保护。

构建价格、补贴、保险“三位一体”的种粮农民收益保障政策体系，实现政策保本。一是价格支持稳预期。积极稳妥改革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和收储制度，以确保口粮绝对安全、防止谷贱伤农为底线，稳步提高稻谷、小麦最低收购价，完善收购启动机制，在粮食播种之前公布最低收购价格，稳定种粮农民的收益预期。二是生产补贴保成本。完善农业补贴制度，提高补贴政策指向性和精准性。一方面，继续加大农业补贴，在确保目前补贴总量不减的前提下进一步增加补贴数量，根据通胀率或GDP增速逐年调整补贴水平，保护种粮农民利益并稳定政策调控预期；另一方面，要根据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目标优化补贴方式，既要扩大耕地地力补贴、玉米大豆生产者补贴，确保重要农产品持续稳定供给，也要探索形成农业补贴同粮食生产挂钩机制，让多生产粮食者多得补贴，把有限资金真正用在刀刃上。三是保险扩面降风险。发挥好农业保险的政策属性，逐步扩大农业保险覆盖范围，实现稻谷、小麦、玉米三大主粮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从覆盖产粮大县到县域全覆盖。并在规范运行、严格监管、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完善农业保险制度，鼓励保险公司完善自然灾害保险产品，变事后灾害赔偿为事前灾害预防，给予种粮农民可持续性预期。

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和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实现经营增效。首先，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大国小农”是我国的基本国情农情，在农业劳动力机会成本急剧上升和耕地细碎化程度不断加深的背景下，要因地制宜地推广代耕代种、代管代收、全程托管等农业社会化服务方式，提高资源利用率和土地产出率，提升种粮农民经营收益。其次，进一步深化农村土地制度

改革。在巩固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同时，不断完善农村承包地“三权”分置办法，发展多种形式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着眼种粮农民经济效益和国家粮食安全两个层面的平衡，突出抓好家庭农场和农民合作社两类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推动农业从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的现代农业转变。再次，持续推进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以密切与农民利益联结为核心，以提升为农服务能力为根本，加大对供销合作社的支持力度，发挥供销合作社在栽赃、植保、土壤等田间管理各环节中的作用。针对化肥、种子等农资价格上涨幅度快于粮价上涨幅度等问题，引导供销合作社为广大种粮农民提供综合性、全方位的农资保障服务，既要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也要加强政府支持保护，全链条保障种粮农民收益。

大力完善农业生产条件，加大对农业生产基础设施的投入。第一，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把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旱涝保收的高标准农田，增强种粮农民抵御自然灾害风险的能力。一方面，中央财政根据丘陵山区和平原地块的生产特征制定差异化的高标准农田建设补助标准，每年单独安排专项经费用于高标准农田灾毁工程修复，提高地方政府推动高标准农田建设的积极性；另一方面，瞄准农业强国目标，把高标准农田建设与高效节水灌溉和大中低产田改造相结合，提高高标准农田建设标准和建设质量。第二，提升农机装备研发应用水平，补齐农机装备短板。针对耕地细碎、机耕道不足、适用机械化设施装备有限等问题，开展农机装备工程化协同攻关，尽快突破丘陵山区适用小型机械、大型大马力高端智能农机装备瓶颈；加快农田宜机化改造，着力解决水稻机插、玉米籽粒机收、粮食烘干等农业机械化瓶颈问题，提高农业机械化程度，降低种粮农民生产成本。第三，加快农产品流通体系建设，推动粮食生产、储存、运输、加工、消费全产业链发展。依托大型流通企业构建全国粮食产品骨干网络和物流体系，完善订单农业和直供直销体系，打通粮食产品产销对接渠道。同时加快促进粮食产品品牌化、商品化、标准化建设，提升粮食产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增加粮食产业综合效益。

加大对种粮农民的培训力度，全面提高种粮农民在农资、农机、农技、信息网络等方面的职业技能，提高粮食生

健全种粮农民收益
保障机制

□ 孙生阳

产效率。其一，深化基层政府农技推广部门体制机制改革，把对农民的培训次数作为考核基层政府农技推广人员工作业绩的重要指标。推动基层政府农技推广部门的机构设置与人事制度改革，提高农技推广服务的可及性，充分发挥政府农技推广部门丰富的管理经验与服务经验，为农民提供更广泛和更好的服务。其二，开展以经济服务为核心的基层干部服务责任制改革，以促进农民增收为目标开展服务工作。鼓励基层干部随时了解种粮农民生产上所需要解决的各类问题，并通过责任制和承诺制服务，确保其及时向种粮农民提供技术、市场和信息服务，使种粮农民的生产经营问题能够在第一时间得到解决。其三，加快农业科技创新，通过技术进步夯实粮食生产节本增收的物质基础。一方面，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加快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抓紧培育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优良品种，提高粮食单产水平；另一方面，大力推进数字农业建设，探索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现代信息通信技术在粮食生产中的普及应用，带动粮食全产业链的数字化转型，提高粮食生产效率。

